

固守传统 学见渊源^{*}

——简评王继如教授《训诂问学丛稿》

袁津琥

(绵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四川绵阳 621000)

王继如:《训诂问学丛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继如教授继一九九九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敦煌问学丛稿》后,又于二零零一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学术论文集——《训诂问学丛稿》。坦率地说,从治学方法上看,该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并无大过人之处,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人”指的是前人,确切地说,指的是乾嘉诸儒及其学术传人如章黄诸公所发明和确立的小学矩矱。但正因为如此,该论文集却体现出了一些有异于时人著作的特色:简言之,就是固守传统,学见渊源。

从西汉第一部训诂专著产生以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们在对经典著作进行不断的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汉语言的规律,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到了清乾嘉年间,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可谓超汉轶唐,集前代之大成。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二:一是清代的语言学家善于吸收前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把它和自己的训诂实践相结合,进而总结上升为理论,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自然攻坚破滞,涣如冰释。比如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就提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指出,汉字由形、音、义三者构成,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研究小学必须树立明确的历史观,也就是时代性。而时代又是相对的;语言是思维的产物(所谓有义而后有音),它先于文字产生(所谓有音而后有形)。所有这些论述即或从现在看来也都符合西方语言学理论。正因为有这些理论做指导,在训诂实践时,段玉裁才表现得高人一筹,如《说文》:“仅,材能也。”段《注》:“才,今俗用之‘纔’字也。……唐人文字,‘仅’多训‘庶几’之‘几’,如杜诗‘山城仅百层’;韩文‘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又‘家累仅三十口’;

^{*} 本文属于作者2003年度省社科项目“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自筹经费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的资助。

柳文‘自古贤人才士，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元微之文‘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轴’。此等皆李涪所谓‘以仅为近远’者，于多见少，于仅之本义未隔也。今人文字，皆训仅为但”^{②第145~146页}。在这里，段玉裁先说“仅”原来是什么意思，再说到了唐朝又有了什么意思，最后说现在是什么意思，显示了“他有历史发展观点，并且重视后起的词义”^{②第145页}。至于清人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成绩能远过前人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是学风优良。像段玉裁和王念孙两人的名作《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都有对方写的序，结果一个在序中夸奖对方的著作是自许慎以来“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一个赞叹对方“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这不是师兄弟间的互相吹捧，而是对对方取得的学术成就的由衷钦敬，是严肃的学术批评。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就缺乏这种实事求是、坦荡的精神，其结果是直接造成目前学术界到处充斥着乡愿式学术批评。为什么好的不能说好，偏偏要说它还有不足，坏的不能说坏，反而要说它也有可取之处呢？套用鲁迅的话说，这不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貌似公允，其实是反替假冒伪劣张目吗^{〔1〕}？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清朝正统派治学的特点归纳成十点：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则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经，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梁启超归纳的这十条，虽然是在近一个世纪前说的，但我以为迄今仍是一切学人所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用现代术语来说，这些是最起码的学术规范（当然其中有几条我以为似是谈的治学方法）。令人费解的是，现在有的人一谈到古代的、传统的，就马上和封建的、落后的、非科学的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就好像一个婴儿可以不经母体孕育，就能一空依傍地直接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全然忘了“文化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袭前人知识之遗产，继长增高。”^{③第94页}其结果是造成我们现在的学者对传统文化谈继承的少了，了解得也少了，个别学者甚至对传统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笔抹杀，动辄揶揄前人以自高^{〔2〕}。此风不加以扭转，学术何谈发展？

〔1〕 我们在这里选用了王力先生所举的例子，不过，段玉裁的这段论述现在看来存在问题，可参张永言《语文论集·词语杂记》，167页，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2〕 比如有个叫葛红兵的博士在《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二十世纪文学致一份悼词》的文章，用傲慢的态度、轻佻的文笔对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学者们进行了吹毛求疵般的批评。这种批评其实正如清人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所指斥的一样，是一种典型的“空疏措大”之风。“空疏措大”之风的表现为“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疵病，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而造成当前这种风气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名心太炽。戴震《答郑用牧书》：“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揶揄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二者不同，鄙陋之心则同。”

章太炎先生谓“读书人于天资、学力、家学、师承，四者不可缺一”〔3〕。本论文集作者的外祖钟山泰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被时人称为“华东之大儒”，其读研究生期间所师从的导师徐复先生、张舜徽先生，现在看来也都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因此这本论文集虽然所收录的文章涉及面较广，但大致不出通诂训、探语源、考俗字这三个方面：通诂训类的文章，像《说“辅车相依”和“颐指气使”》、《说“巉岩”》、《释“摧藏”》等，皆辨析入微，这部分文章和作者在进行敦煌俗字考释时的一些论断，真如黄侃先生称赞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一样“征引训诂，求其通假，不独合于古音，并求合于等韵”^①第265~266页，像文集所收录的对敦煌变文中“手提三尺之剑，请托六尺之躯”^②第243页、“损凡香气”^③第260页等处的校勘，绝非当今一般泛泛之辈可为。更值得称道的是，在以声音贯串训诂时，文集作者并不一味墨守传统的声韵体系，而是根据书面材料所记录的语言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像《伍子胥变文》“昼即途中寻鬼路，蹊影藏形恒夜游”中的“蹊”，作者认为当读作“掇”^④第257页，但二字在《广韵》中，声母有泥母与书母之别，就声而言，说两字通读，显然对《广韵》系统是有所突破的，不过考虑两字都从“聂”得声，说他们通读应是有根据的。《维摩碎金》“争知于是一场梦，未会人为四毒蛇”中的“于”作者认为应读做“伊”^⑤第259页，更是完全突破了广韵韵母系统的束缚，什么时候遵守当时的声韵体系，什么时候，根据语言实际，突破当时的声韵体系，避免陷入“宁信度，无自信”的尴尬境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要有很高的音韵学素养；探语源类的文章，像《说“慕”》^⑥第203页、《“龙钟”董理》^⑦第211页等，具得徐复先生语源学研究方法之精髓，而《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词典〉述评》一文^⑧第284页，又显示了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广以及在试图引进国外语源学研究成果，丰富完善自身理论方面所作出的尝试，由于评论者本身对语源学素所留心，所以文中的批评都极为精到，比如说“语源研究是‘求大同，存小异’的研究，如果对音韵没有科学的宏观的分类，就会流于汗漫无边，或失之苛碎支离。……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声类分得越细越好，那也会模糊了对本来是同源的词的认识，失之支离。从语音学来说，只要是科学的分析，当然是越细越好。但从语源学来说，如果只注意语音微观上的小异，而不能求宏观上的大同，那是难以进行研究的。因为同源字的产生，是在大致的语音分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在细微的音素分析的基础上的”^⑨第289页。读到如此深刻地批评，我们自然会想到曹子建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虽用于文学批评，不免失之一偏，但用来移论学术批评，却自为无可非议。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当今的学术界的不少学术批评文章，有不少简直就像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序》中所指责的一样“义既非义，文又非文”，换句话说，既不见其中有什么学术价值，又难睹评论者文笔之佳妙，不伦不类，适成“伪体”。我们真诚地希望当前的学术评论家们能多多

〔3〕 此据黄焯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石定果《题辞》转引，直接出处，愧无所知，参《黄焯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另外，值得在这里申说的是，近几年，不少学者曾著文探讨为何当代产生不了大师，窃以为造成当代缺少大师的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却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穷一生精力为之，故前人首重家学、师承，我们注意到，最近费孝通先生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师承·补课·治学》（三联2001年版），费先生可是拿得洋博士的。而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当今五六十岁这批人，都谈不上有什么家学；至于师承，由于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脱轨，年轻人在学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几乎失去了亲炙名师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使得现在的这批学者无论知识积累、还是知识构成，与前人相比，都如“速成班”毕业生。尤可怪者，在当今教育体制下，不少人从甲专业，考取毫不相干的乙专业研究生，三五年混得一学位后，竟也能开科取士，这种人更无所谓家学、师承了。

写出像文集作者所写的这种高质量的学术批评文章。至于考俗字类的文章,因作者此前已收录于《敦煌问学丛稿》一书,故本论文集收录的较少,不过这却是作者近十年来学术转向后研治的一个重点,也是作者最见学术成绩的一个部分。窃以为以前的敦煌俗字研究,虽成绩巨大,但尚嫌“粗放”,远远还谈不上“精耕细作”,本论文集的作者以徐鸣谦先生所授探语源之法,治蒋云从先生毕生从事的敦煌俗字研究,较同辈学人起步稍晚而创获颇丰。集中《敦煌俗字研究法》^{①第231页}、《敦煌通读字研究刍议》^{①第239页}二文,发凡起例,既略见作者研治方法之一斑,也足以使我们认识到目前敦煌变文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还远远未到有些学者所说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我们在阅读本论文集时,会发现作者在文集中经常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作者的本师徐复先生、一个是与作者有世谊的蒋礼鸿先生。这不是拉大旗作虎皮,众所周知,徐复先生退休前不过仅是一个硕士生导师,作者在这里反复称及徐复先生,我想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显示了作者对徐复先生治学方法的崇敬(作者将徐老的治学方法简要的概括为:探语源);二是明示时人自己的渊源授受。确实,我们读这本论文集,总是觉得仿佛依稀从中看到了徐复先生等前辈的影子,看到了徐复先生等前辈的治学方法和优良学风。比如作者在论文集中对徐、张、蒋诸位师长的反复称说,使我们想到了徐复、蒋礼鸿、张舜徽诸先生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对自己的师长的深切怀念^{〔4〕};作者对门弟子调查结果也予注名,不隐人善的做法^{①第16、第264页},又使我们想到作者当年的老师徐复先生也正是这样做的^{⑤第367页};而作者的《通假字拾话》^{①第174~179页}、《“局”字从厂从句句亦声”说》^{①第218页}等文,和徐复先生的《通假字质疑》^{⑤第340~344页}、《农、襄二字古文说》^{⑤第8页}、《畐从合囟说》^{⑤第6页};作者的《敦煌俗字研究法》^{①第231页}和蒋礼鸿先生的《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⑥第36页}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不待称说。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作者在《语词溯源与词典编纂》中对后汉崔骃《与窦宪笺》中“公侯非麋兕射”一句的校勘^{①第191页},和徐复先生对《荀子·正论》“故鲁人以糖,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一句的校勘联系在一起^{⑤第134页},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徐复先生的治学方法对作者的影响有多深^{〔5〕}。可惜呀,今人论著中绝少有提及自己师长者,不知是嫌自己的老师名头不响,不值得称扬呢?还是如今的老师都已摇身一变为老板,师生之间已经全然没有了以前那种共同献身于学术的真挚的情感呢?亦或是现在的学生出师后都想学孙悟空呢?不过,孙悟空学成之后,闭口不谈自己的老师,是怕连累自己的老师,现在的学生呢,恐怕更多地是担心连累自己,怕别人说自己的成就是来自老师的传授,影响自己将来的学术地位吧。

需要指出的是,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虽以字词考辨类为主,但也不乏一些反映了作者在理论与方法上所作的探索,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怎样看待前辈学者提出的“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蒋礼鸿先生曾说“考据学者曾提出‘孤证不立’这个戒律,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主要看证据立不立得住脚。立得住一条也够

〔4〕 我们只要随便翻翻《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就能看到他们对自己老师章炳麟、钟泰等人的称说,而张舜徽先生《旧学辑存》中更有《忆往编》专章记述自己所交往过的师长。

〔5〕 文集作者曾自述文革后,得到徐复先生《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油印本时,欣喜不已。而这里作者纠正的恰恰属于一个二重误例中的“既讹且倒”的例子。

了”^{⑥第36页}。只是，蒋先生所论尚嫌含混，缺乏可操作性，什么叫证据立得住脚，什么叫立不住脚，衡量它们的标准又是什么。本论文集的作者则指出，所谓“孤证不为定说”，主要应是针对排比用例法，若“探源法则不惧孤例，只要能得其正确的语源，孤例也可解，而且可一语破的，以简驭繁，不必多举用例”^{⑦第310页}。这个论述就比蒋先生要清楚明确多了。对“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笔者也早就作过思考，笔者个人认为不仅探源法不惧孤例，排比法同样也不排斥孤例，大概在七年前，笔者在阅读《九尾龟》第一百六十一回时，发现其中有“沈二宝见了那少年男子居然向他一笑，只喜得眉飞色舞，毛骨悚然”之类的语句，就给《辞书研究》写了篇小文，大意是说现行辞书一般把“毛骨悚然”这个词解释为形容一个人受到惊吓或恐惧的样子，释义未免太窄，其实，应释为受到外部强烈刺激，初不论这种刺激是好的还是坏的。结果被编辑部退稿，理由就是“孤证不为定说”。当时曾想就此撰文展开讨论，然因循未果。现在愿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以为前辈学者提出“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你如果只把你的论点建立在一个孤零零的证据上，特别是这个证据如果还是出自古代典籍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既是孤证，就说明它出现的语言环境单一，你不能保证你对引用材料的理解绝对正确，你也不能保证这段古籍在传抄中没有发生讹误。比如，有人仅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一段话，就说其中的“信”是“书札”的意思^{⑧第60页}，可我们不禁要问：“信”还可当“信物”讲，为什么这里的“信”不能说成是“信物”的意思呢？你能肯定你对古籍的理解就绝对正确？又如胡应麟仅根据他所见《历代三宝记》中有“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就说雕版始于唐代^{⑨第36页}，在这里“雕版”自然不存在歧义，可你能保证你引用的这段古籍没有讹误吗？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问题又有两个方面，就拿词语考释来说吧，笔者认为对于出现在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中，语境明确，不含歧义，又不可能发生讹误的个别存在着有异于常义的词语的语句，即或是孤例，我们也应承认这种语言事实，而不是漠视这种语言事实。像前引《九尾龟》中的那句话，我们既可以排除句中“喜”是“吓”字之类讹误的可能，也可以排除“毛骨悚然”是“手舞足蹈”之类词语讹误的可能，更可以排除版本发生歧异的可能，那么 we 有什么理由否认“毛骨悚然”可以用来指一个人高兴的样子呢？法律上不是还要讲“谁主张，谁举证”嘛。研究语言既要承认语言的“通”（语言的使用要遵守一定的通则），又要看到语言的“变”（语言又是变化的），并且语言的“变”多是渐变，所谓一叶落而后天下秋。忽视语言渐变在书面材料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审慎虽不失审慎，却未免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

二是作者提出希望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们能同时将探源法和排比法施之于同一个词的训诂，以提高训释的准确性^{⑩第310页}。其实，我以为不仅是要将探源法和排比法，结合起来使用，还要尽可能的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为探索语源也好，排比用例也好，各有攸当，不可偏执一端。比如运用探索语源的方法，对使用者的小学素养要求较高，并且也不是所有的词我们都能弄清其语源；而有些词语的考释，又几乎无法运用排比用例法，像方以智在《通雅·谚语》中一共列举出了联绵词“逶迤”的三十二种异写形式，其中有的书写形式古籍中仅出现过一两次，如果凭借排比用例法对这些词进行训释，恐怕是不可能的吧。我们看王念孙《读书杂志》，就会发现他就经常是使用各种考释方法以对词义进行探寻，比如既根据

异文,又根据对文,还运用排比用例和探源法,假设根据异文考释词语语义的准确性只有50%,根据对文或排比用例考释词语语义的准确率也不高(为便于后面计算统一定为50%),那么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所得出的结果都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几乎没有使用的价值,但三种方法一旦结合起来使用,其准确率就能一下提高为 $1-(1-50\%)\times(1-50\%)\times(1-50\%)=87.5\%$,可谓八九不离十了。虽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已经具备了使用价值,这就是二王在词语考释中为什么精诣罕匹之所在。反之,如果二王在词语考释中仅仅使用其中某一种方法,则每每出现错讹,我们只要仔细分析章太炎在《王伯申新定助词辩》、裴学海在《古书虚字集释》中对二王的批评,就自然会明白这点。可惜这个道理现在有的人竟然还不知道,仍然单独使用某一种方法如异文或对文来进行词语考释,这就没有了清儒的谨严而只得其流弊了。

对于古籍数字化工作,本论集作者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说在进行古籍录入时,“要尽量不要去改动底本,有异文尽量在校勘记中去说明,以免形成一个在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新的本子”^①第340页。而当前不少电子图书连所据版本都缺乏必要地交代(是否怕侵权),更不要说校勘记了,因此“只能作为索引,无法直接使用”^②第43页。可惜,有些人见不及此,反把什么宝典之类当成枕中秘籍,喜其“绝无检书之劳,而有引书之乐”,使用时,根本不进行任何说明,既有悖学德,也是对读者的极端不负责。

当然,本论集也并非尽善尽美。首先从体例上讲,作者标注参考文献页码,前后龃龉。忽而“页多少多少”,忽而“多少多少页”,这种情况在《敦煌问学丛稿》中就已经存在,而作为曾为之撰写书评的人,我不得不在这里承认,没有尽到一个批评者的责任。其次在词语考释中,有时作者放弃了自己坚守的探语源之法,而运用排比法,结果造成在排比用例,提取词义时,没有坚持词的常义原则,释义缺乏说服力。像书中55页说“地,指血亲关系”,我认为就不如说“地”是指门地,直截了当。同样,61页说“时来,义同昌运”,更属错误。我个人认为“时来”根本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或短句,它的意思是“时机到来(的时候)”,该词组似从《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时乎时,不再来”句而来。罗隐《筹笔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运去”对举,其为一主谓关系的词组而非一偏义关系的词组更为显豁,不知作者为何在正确指出其为主谓关系的词组后却用了偏正词组去解释。再说将“时来”释为“昌运”,“昌”义从何而来?65页作者仅据两则语言材料中相关语句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说“拉”有“超越”义,也嫌证据薄弱,我们不怀疑作者考释的正确性但似还应结合其他考释词语方法,以探明其确切词义,否则缺乏说服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界一些人每出一本书,总热衷于找一些不明不白的人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美其名曰学术影响。其实一本书是否具有学术上的价值,本无关乎能否在当时博得多少通俗名气,而在于这本书本身是否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并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书评都无写作的必要,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书无须借重于我们的批评而没有价值的书则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批评。

参考书目:

①王继如《训诂问学丛稿》[C],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②《王力文集》(第十二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 ④《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⑤徐复《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⑥蒋礼鸿《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C],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⑦马增芳《书书信小考》[J],《文史知识》1966年6期。
- ⑧袁津琥《信、书信小考商兑——也谈“信”的“书札”义的起源时代》[J],《文史知识》,1997年4期。
- ⑨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 ⑩袁津琥《评王继如敦煌问学丛稿》[J],《绵阳师专学报》,2001年6期。

袁津琥,男,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